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女性

Female and Modern China Society

与近代中国社会

杨剑利◆著

学者文丛·社会理论前沿书系



中国社会出版社
China Society Press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

杨剑利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杨剑利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5087 - 1690 - 9

I. 女... II. 杨... III. 妇女—问题—研究—中国—近代
IV. D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0280 号

书 名: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
著 者: 杨剑利
责任编辑: 姜婷婷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51698 电 传: (010) 66051713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240mm × 17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凡中国社会出版社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陈 桦

女性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且不说她们始终与男性成员共同创造着历史,并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就人类自身的生产、繁衍和延续过程来讲,女性所起到的作用,不仅无法替代,甚至可以说也超过了男性成员。因为没有种族的生育和繁衍,也就不可能存在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人类历史与群体社会。自古至今,人们始终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母亲的爱戴与赞美,它甚至出现在一些宗教的教义与仪式中。人们的赞颂和讴歌无疑是发自内心的,它没有种族的界线,超越出国界,在时间上也几乎是永恒的。这种跨越时空的纯朴感情,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及社会在潜意识中对女性所做贡献与应有地位的肯定。

但是,由于受到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及生产力水平的影响与制约,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在母系氏族社会之后,则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底层的状态,甚至长时期遭到歧视。在男性牢固地掌握着各种权力及资源的社会里,作为一个群体,女性实际成为了男性的附属。这种附属性不仅表

现在男女之间的关系、家庭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之中,而且浸透到从国家法律到世俗观念,从政治生活到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尽管人类社会进入到大机器工业时代后,文明程度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女性社会地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然而远没有得到本质性的改观。

近代社会是中国大动荡、大变化、大转型的时期。在来自于封建社会内部代表先进时代因素的萌动,以及来自外部世界的西方资本主义冲击的双重作用下,维持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制度及其存在的基础,开始全面分崩离析。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体制,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生产模式,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孔孟儒教,在从未有过的强大挑战面前,逐步丧失其原有的社会主导位置,代之以具有工业化社会特点的全新的体制与理念。

巨大的社会变革也为女性及其生活带来了变化和新气象。盛行千余年的“缠足”陋习受到诟病,肢体摧残不再为美,妇女之“天足”得到社会的认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批判,经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近代“女学”兴起,女子接受正规教育成为可能,女子小学、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等专门的女子教育机构相继在各地出现,女性教育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政治意识觉醒则是中国近代女性最重要的变化。摒弃“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投身救国救亡的革命活动。在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同盟会”中,不乏女会员的身影。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更是有成批的知识女性走上了斗争的最前列。

然而,女性社会地位的彻底改变确是一个充满艰难曲折的漫长过程。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中,遇到阻力最大的也许就是女性地位的改变。这不仅仅因为极力宣扬“男尊女卑”的孔孟之说早已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各阶层,而且还由于整个社会仍然牢固地处于男性公民的掌控之中。

就历史研究而言,女性及其生活环境是考察社会发展演变所不可缺少的重要角度。女性的地位及其生存状态,从一个侧面向人们深刻地揭示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从政治法律到习惯意识,从主流思想观念到宗教民间信仰,无处不涉及妇女问题。同样,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不断地改变着女性群体的生活与命运。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女性问题显得尤为醒目,因为它与全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正如本书作者杨剑利同志在书的“导论”中所指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揭开了女性近代化的序幕,并带动了女性的近代化发展,而女性的近代化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近代化发展进程;没有社会的近代化就没有女性的近代化,而没有女性的近代化,就没有真正的近代化。”

显然,近代化中的女性是本书的着力点。全书视野开阔,涉及面宽广,与近代中国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领域,如社会习俗、文化教育、婚姻家庭、经济生产、法律法规、政治活动等,均予以较为深入的探讨和描述,向人们展现出一幅社会近代化大潮流中,中国女性生活的多维图景。杨剑利博士近年一直致力于近代中国女性问题的研究,涉猎颇广,用力甚勤,相信她的大作将会为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带来新的启示。

二〇〇七年二月一日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近代习俗与性别	(13)
第一节 传统礼俗与性别观念	(13)
第二节 溺女:性别歧视的陋俗	(19)
第三节 缠足:束缚女性与强化性别差异的陋俗	(31)
第四节 陋俗的改变:近代放足运动	(46)
第二章 近代女性教育	(66)
第一节 传统教育与教育的近代化	(66)
第二节 近代学制中的女性教育	(71)
第三节 近代女学的实践状况	(79)
第四节 近代教育的性别化透视	(97)
第三章 近代婚姻与家庭	(106)
第一节 近代婚嫁习俗	(106)

第二节 女性与生育	(117)
第三节 近代的贞节观念	(125)
第四节 近代家庭生活中女性的格局	(132)
第五节 离婚与再婚	(142)
第六节 过渡及变迁——女性与婚姻家庭的近代化变革	(151)
第四章 近代女性的经济活动	(166)
第一节 女性的社会经济权利	(166)
第二节 经济自立思潮之萌发	(178)
第三节 产业女工	(183)
第五章 近代法制与性别	(201)
第一节 传统法统下的性别关系	(201)
第二节 法典中的性别关系	(205)
第三节 法律实践活动中的女性问题	(219)
第六章 近代女性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	(234)
第一节 女性与政治隔绝的历史传统	(234)
第二节 清末民初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政治意识	(237)
第三节 近代女性的爱国运动	(242)
结 语	(249)

导 论

纵观中国社会发展史,人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始于近代。在“西学东渐”触发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近代中国的社会改良家和知识分子开始认真思考女性问题,并将其与伦常纲纪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发端于“维新”、高涨于“五四”的有关女性问题的大讨论和妇女解放运动,将近乎被遗忘在历史尘埃里的中国女性发掘了出来,成就了晦暗中国女性发展史上一个难得的闪光时刻。然而,如同许许多多其他的闪亮一样,关注女性问题的闪亮在命运多舛的近代中国社会被后来沉重的苦难湮没。

女性问题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命运交错在一起,构成了近代中国女性发展变化的画卷。与“兴邦救亡”的使命粘连,这幅画卷无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政治史画的意蕴,史学家们也多从政治史的角度来描绘这幅画卷,解读近代中国的女性问题。不可否认,政治史的阶级分析方法勾勒了历史纵向发展的主线,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往往因此被忽略。本书试图在已有政治史刻画的基础上,以社会史多侧面、多层次的横向考察视角和性别理论的分析方法来描摹近代中国的女性画卷,希望揭示出变动不居的近代中国社会中女性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也用以提示性别问题和近代化的关系是探讨近代史过程中不应该被忽略的另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在开始描画之前,有必要对有关女性问题研究的历史线索和现状做些必

要的交代。

一、女性问题研究的历史线索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个安稳的乡土社会,依着伦常纲纪运转,社会结构固若汤城,难以发生大变。到了近代,在西方殖民主义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汤城开始裂变,闭关守旧的姿态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文明面前也开始改变,“师夷制夷”作为一种拯救国势的手段得以倡导。在东西方文明接触的过程中,“西艺”、“西学”大量涌进,其中女性主义理论便是“西学东渐”过程中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思想之一。女性主义理论源于西方的女权运动,受18世纪末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强调“天赋人权”、“自由”和“男女平等”的观念,组织妇女运动并积极号召争取女权。女性主义传入中国后备受思想界关注,并且启发了知识分子重新考虑家国与个人的关系,尤其是女性修为与家国兴盛的关系,由此开启了近代社会妇女问题的讨论与研究。

近代中国的妇女研究,确切而言,并非乡土性的,而是在乡土社会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接受了西方文明思想的新知识分子的妇女观的体现。新知识分子的妇女观包括男性妇女观和女性妇女观两种,代表近代妇女研究的两条主线。男性妇女观的代表分为维新派知识分子和新文化知识分子两派;女性妇女观的代表者主要为近代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女性和革命女性。这些人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乡土社会,是近代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新型阶层,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性。

维新派包括早期维新派和维新改良派。对于当时的妇女问题,两者既有共同的主张,又有不同的设想。最早关切妇女生存状况的早期维新派,通过不同的途径感受或经历过西方文明,西方社会“男

女平等”现象直接引发了早期维新派对中国的性别问题的对比与思考。他们主张妇女教育,反对缠足。一般说来,早期维新派对妇女问题的思考是西方社会的一些新现象对他们在感观上的直接刺激所引发的,是一种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框架下改造国家的设想,他们的主张更主要的是一种在东西直接对比之下的限于感情层次的对被压迫被束缚的妇女的同情,还没有形成明确系统的认识,只是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在妇女问题上的初步觉醒。不过,早期维新派兴女学、废缠足等思想和行为对传统封建性别观念却造成了相当的冲击,在近代男女平等思想演进中也起了前驱的作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维新知识分子提出的妇女问题是早期维新派的延续,所不同的是,他们以“废缠足”、“兴女学”为突破口,将妇女解放放在了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手段的位置上。戊戌维新派提出的妇女问题极具国家民族主义色彩,这在家国一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而且戊戌维新派以西方的“天赋人权”和“民权”观念为理论指导,从更广的方面提出妇女问题,形成一套系统的阐释。

伴随着“天赋人权”与“民权”观念的引入,女权主义理论也作为一种救亡的理论指导引入中国。这一理论主要由马君武介绍引入,其主要观点是用天赋人权的观点论证男女平权,反对对妇女实行专制,将妇女的生存状况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尺度之一。马君武译介过来的西方“女权”观念成了当时妇女研究者的主要理论武器,女权运动由此被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看成是西方先进文明的一种象征,这也促使以西方文明为追求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竭力鼓吹女权,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视为现代性的鲜明标志,促使那一时期的女权“声浪高涨”。

男性妇女观的另一派新文化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

迅等都表现出对妇女问题的极大关注,都撰写文章阐述自己的妇女思想,新文化知识分子将以前几乎一片空白的妇女问题推向了比较具体的研究,从而首次丰富了这块贫瘠的土地。他们认为:(1)妇女被束缚压迫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2)妇女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才能获得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3)妇女解放同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妇女的解放也是人的解放;(4)倡导妇女的反抗意识;(5)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审视性别问题;(6)(胡适、周作人等为代表希望)通过思想改革与知识更新来实现女性的个人觉醒,进而达到真正的妇女自我解放之目的。可见,相对于中国两千年封建等级文化中形成的传统妇女观以及维新知识分子的妇女观而言,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妇女观已经带有明显的妇女解放意味,这种妇女解放观无疑是开创性的,具有划时代的历史突破意义。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谈论妇女解放成了一种时尚。新文化的喉舌《新青年》专设了女子问题专题,各种报纸杂志都刊登女子问题的文章,妇女报纸的数量增长,形形色色的妇女问题成为讨论、研究的热点。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郭箴一的《中国妇女问题》、赵凤喈的《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茹迪焘主编的《中国妇女经济问题》、安家伦的《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等都是这时期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后来研究很好的借鉴。

女权理论不仅启发了男性知识分子,也成为清末以来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女性提出的妇女解放的理论武器,带来了近代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近代中国女性中,女权观的引入首先震动的是资产阶级上层女性知识分子,她们开始纷纷提出自己的妇女观。当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金天翮、陈撷芬、秋瑾、张竹君。

1903年,金天翮的《女界钟》出版,成为晚清女权主义的代表作。书中猛烈抨击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种种专制压迫,要求回复妇女的

权力,提出“国民之母”的口号,这正是总结了自戊戌变法以来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的社会期望。对此,陈撷芬等人则认为,“国民之母”的形象是“便于男子之女学”,“便于男子之女权”^①。她们主张女权的获得,“乃夺得也,非让与也”^②,重视女性本身去争取权利。她们眼中的“女权”包括了女性对男性要求权利运动、作为中国人对清朝要求权利运动以及作为“中国”对列强要求权利运动^③。陈撷芬等近代女性启蒙者肯定妇女对国家的义务,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国家。金天翮等曾主张将女性回复“天赋人权”与为中国富强效力的“国民之母”这两个目的结合,以发展“女权”。但陈撷芬早已敏感地指出,这样的“女权”存在很大矛盾:这是将没有性别差异的“天赋人权”与拥有性别角色的“国民之母”勉强结合。可见,陈撷芬主张建立在性别差异之上的性别平等。

相比陈撷芬的女权观,秋瑾的女权观多了些激进。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革命家以其短暂的一生实践了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她指出女性不是男性的“奴隶”,主张女性摆脱男性的压迫自立。她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中说:“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生,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她所说的女性自立就是:摆脱传统女性的性别角色和像“国民之母”这类的新性别角色。实际上,秋瑾重视

① 1902年,陈撷芬在《独立篇》中指出中国“女权不振,女学不讲”的状态:“(女性)徒以生命肢体委之男子。即有以兴女学、复女权为志者,亦必亦提倡望之于男子。无论彼男子之无暇专此也,就其暇焉,恐仍为便于男子之女学而已,仍为便于男子之女权而已,未必其为女子设身,……呜呼,吾再思之,吾三思之,殆非独立不可!”见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245页。

② 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12页。李又宁:《华族女性史料丛编》(1),纽约天外出版社,2003。

③ 陈撷芬:“我辈数千年为彼奴隶,岂至今日时尚昏然不知,再欲随男子之后,而做异族奴隶之奴隶也。”张玉法、李又宁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龙文出版社,1995年,第245页。

“天赋人权”甚于“女权”，她所主张的理想女性形象是“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的女性。如此看来，可以说秋瑾尽管也是根据男女二元对立的结构来讨论女性解放问题，但是，她以男性角色为理想，主张的是取消性别差异的性别平等。

医生出生的张竹君从女性健康的角度出发，指出缠足是一种对女性身体健康的极大伤害，但是女性缠足是为了获取男性的青睐，这是女性“依赖之根性”，这种依赖实则是封建文化浸润之下的一种心理状态。因此，女性的身体健康首先是建立在自立的基础之上。^① 不过，张竹君虽然批判女性“依赖之根性”，却未否定性别角色，她肯定女性的母亲角色，但既然女性拥有可以做“人群之母”的特性，所以不应该依赖男性，一定要做一个自立的“人”。简言之，张竹君更加重视女性个人的存在价值，强调个人特色的社会角色，这是一种新的女性观，相比之下更具有现实意义。

总的来说，近代以来男性妇女观和女性妇女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女性的社会定位。男性妇女观将妇女作为救亡保国的一种手段，仍将女性置于一种客体的位置。与近代以来男性妇女观对照，女性妇女观首先从本质上指出了男性妇女观的缺陷，提出女性权利的获得要靠自身去争取，而不是被动的等待，反映了她们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张竹君主张个人特色的社会角色，不仅包含了对女性的社会角色的新探，其实也关系到对当时社会中男性的社会角色的反思，今天看来，这更具有性别理论的色彩，更有客观、理性色彩，而且女性的妇女观中包含着强烈的忧国爱国意识以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与义务。但女性妇女观中也存在着关于性别认识的区别，秋瑾主张没有性别差异，而陈撷芬与张竹君认同性别差异，这也可认为是一

^① 见张竹君：《卫生讲习会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5月25日。

种性别建树问题,即如何建立一种更正确的性别观念。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学术界要探索的任务之一,就这一点上而言,我们今天仍是在寻找前代已经提出来的问题的答案。近代女性主义启蒙者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以及社会的性别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女性问题研究的现状

尽管 20 世纪初期以来,人们对女性问题做了比较广泛的讨论,但严格来讲,这个时期对妇女问题的讨论在总体上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妇女研究。妇女研究是妇女运动的学术武器,其主题是“为了妇女”和“关于妇女”。而近代妇女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出于一种寻求救国途径的目的,尤其是男性知识分子,把妇女当作客体与手段,其初衷是偏离“为了妇女”的妇女解放之路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宪法直接赋予了女性与男性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同样的权力。性别问题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浪所湮没。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下,中外文化交流逐渐频繁起来,国外的一些新的学术研究与理论视角也开始传入国内,对国内的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从而开始了国内的妇女学研究。女性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译著的形式传入中国。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朱虹分别于 1981 年和 1983 年编选了《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和《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在这两本小说选的“序言”中,朱虹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作品进行了初步介绍。1984 年翻译过来的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其中有六七万字的篇幅讨论美国女性文学,这些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首次较为集中的论述,引起了国内文学批评者的关注,书中的观点一度成为中国早期女性主

义批评的资源而被援引。国内学界的关注,导致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介绍。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女性的秘密》和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可被看作是对国内女性主义学者最具震撼力的著作。1989年,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玛丽·伊格尔顿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出版,首次将系统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引入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译介范围日广,翻译中既有当代研究,又有古典著述,如1992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林建法等人翻译的陶丽·莫依的《性与本的政治》,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较新成果。199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玛丽·奥斯特克拉夫和约翰·斯图加特·穆勒的《女权辩护》和《妇女的屈从地位》则是女性主义历史上的经典。作为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理论标志的凯特·米莉特的《性政治》的翻译出版反倒较晚,但此书翻译出版后即成为国内谈论西方女性主义的主要资源。

随着国内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译介,国内的女性主义研究逐步从评介走向应用。与20世纪初的女性研究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女性研究队伍以女性学者为主力,把女性本身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对女性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弥补了传统史学由于对女性的忽视而造成的缺陷。妇女研究给学术领域带来了极其明显的变化,各种与妇女相关的研究成果充实了学术领域,而且妇女研究启发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创新。研究者们从性别的角度来重新阐释人类历史,从而呼吁健康、平等、公正、和平的两性关系,共创美好家园。随即,一系列观点新颖、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在资料方面,全国妇联妇女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妇女运动史资料》(5册)与李又宁、张玉法编写的《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下册)是目前

较为通用、颇具权威的史料。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由大连大学的李小江教授主编的“中国妇女研究论集”:《夏娃的探索》、《女性观念的衍变》、《女性审美意识探微》、《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华夏女性之谜》,开启了女性研究本土化与新理论、新视角相结合的肇端。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妇女研究从理论构建、资料诠释上更加完善,如李小江主编的“性别与中国丛书”:《平等与发展》、《批判与重建》,李银河的《女性权力的崛起》、《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王政的《女性的崛起》,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李秋芳主编的《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中国妇女五十年理论研讨会文集》,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等,其中既有西方理论的译介,也有基于本土意识的创造。

虽然妇女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不断有学者指出,如果将妇女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武器,是否又陷入了“女性中心主义”^①的偏执,那么这样是否又会带来新的性别对立呢?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社会性别研究”备受关注。

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开拓起自西方,20 世纪 90 年代来到中国。社会性别理论指出,“性别”的意义不仅仅是区别男人与女人两类群体的自然属性,它还表示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性别理论强调男女在社会方面的差异,即男女两性由于生理差异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对男女两性的角色不同的期望、不同的要求和限制。这种差异是人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培养形成的,也是在整个社会的意识

① ①一切妇女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女性;②以妇女为中心的含义,主要在于突出妇女的主体性;③这种研究应代表妇女的利益,是批评性和主动性的。P. M. Lengermann and J. Niebrugge—Brantley. 1990. “Feminist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near—future prospects.” In G. Ritzer. Ed.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The New Synthes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317.